

辜鸿铭《春秋大义·序言》汉译效度研究

马林放, 杜巧阁*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郑州

【摘要】辜鸿铭为清末民初中学西进的领军人物, 其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著作是由 10 篇英语版政论文汇编而成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文题名为《春秋大义》, 当代国内学者多译作《中国人的精神》。该文集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精神与价值, 尤其是序言部分, 更是突出了中华文明正义与礼法的精髓。迄今为止, 国内已出版 10 多个中文译本。随着越来越多译本的出现, 低质重译问题日渐凸显, 主要表现为文化误读、专有名词误译、译名不规范等, 严重影响了中文读者对该文集的客观评判。本文借助自建英汉平行语料库, 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并结合各译本中的典型案例, 对比较普遍的共性问题展开翻译效度研究。期待本研究能够让中文读者对辜鸿铭及其《春秋大义》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关键词】辜鸿铭; 《春秋大义·序言》; 翻译效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4 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辜鸿铭《春秋大义》中国智慧国际传播的策略与效能研究”(项目编号: 242400411217)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4 年 11 月 13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12 月 20 日

【DOI】10.12208/j.ssr.20240059

A study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validity of Ku Hung-Ming's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reface*

Linfang Ma, Qiaoge Du*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Abstract】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Ku Hung-Ming's most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work is titled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ich consists of 10 English political essays. Ku himself entitled this work a Chinese name called 《春秋大义》 while most domestic scholars prefer to translated it as 《中国人的精神》. T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deeply elucidates the spirit and valu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specially its preface, which highlights the essence of righteousness and rules. So far, more than 10 Chinese versions have been published. However, with more and more versions published, issues like low-quality retranlatio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mainly manifested in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proper nouns mistranslations, and non-standardized translation terms, which severely affect Chinese readers' objective judgment of this work. With the help of self-built English-Chinese parallel corpus, this study employs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combines typical cases from various versions to conduct a translation validity study on the common and universal translation issu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Chinese readers wit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Ku Hung-Ming and his work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Keywords】Ku Hung-M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reface*; Translation validity

1 引言

1915 年, 北京日报社首版辜鸿铭的文集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22 年商务印书馆再版时略作扩充, 共收录了作者于 1883-1914 年间发表

的 10 篇英语政论文, 具体包括“*The Religion of Good Citizenship*” “*The Chinese Wo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Scholarship*” 等, 作者本人的中文题名为《春秋大义》, 当代学者多译作《中国人

*通讯作者: 杜巧阁, 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经典重译、法律翻译。

的精神》。《春秋大义》一经出版,即畅销国外,德国和日本尤甚,有些高校把它列为必读书目。作为近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辜鸿铭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明明精通西学,却被认为极其保守。黄兴涛(1995)^[1]曾指出:“在西方,辜鸿铭俨然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在中国则成为‘新青年’们抨击和嘲讽的顽固象征。”《春秋大义》深刻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与中国人的宝贵精神。从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反观国内外学界对辜鸿铭作品及其个性的损誉参半评价,这与其译本的翻译质量不无关系。1922年,陈曾谷发表了第一个中文节译本。1996年,黄兴涛与宋小庆合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随着更多汉译本的出现,低质重译问题日渐凸显,特别是译文的效度,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视角。翻译效度最先由切斯特曼提出,指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和受体期待的实现程度,是评判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霍跃红,邓亚丽,2017)^[2]。庆幸的是,当今语料库的出现极大地便利了学者发现各个译本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因此,本文以《春秋大义·序言》为研究对象,依托9个中文译本,自建中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分别是陈高华与杜川译本(2011: 3-13)^[3],何叶译本(2011: 2-17)^[4],黄兴涛与宋小庆译本(2020: 2-24)^[5],马永琴译本(2003: 1-16)^[6],秦海霞译本(2008: 8-34)^[7],李静译本(2021: 2-16)^[8],孙永

译本(2022: 3-19)^[9],颜林海译本(2009: 11-19)^[10]以及张恒译本(2013: 1-12)^[11],针对其中典型的翻译问题进行翻译效度的探讨。

2 翻译问题的概述

2.1 普通词汇误译问题

文化因多样而精彩,但是多元的文化为翻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容易造成文化的误读,进而导致误译。目的语中缺少源语的文化现象,目的语与源语在词汇内涵中的差异都会导致文化误读。在大多数情况下,误读不利于跨文化交际(朱海玉,毛新耕,2009)^[12]。常见的误读有忽略语境义、过度依赖字面义、隐性文化含义丢失三种形态。在处理词汇翻译,尤其是多义词翻译的时候,容易造成误读问题。译者过于依赖某些词汇的表层意思,而忽略了深层含义,进而引发误读带来的误译,影响翻译的质量。序言部分辜鸿铭曾用到一个词 *Chinaman*,字面含义是“中国佬”,具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贬义色彩,不宜直译。但是他创作这部作品的本意是宣扬中华文化的优质特性与中国人的优秀精神品质,所以理应翻译成“中国人”。如果事先不对某些特定的文化背景信息加以了解,很容易犯误读的错误。借助语料库工具,本文从词汇层面对三类文化误读的翻译问题进行分析,希望通过统计数据的定量研究,更客观理性地考察这类现象。

表1 普通词汇误译实例

原文	翻译	频数	频率
no, not even what institutions, what arts and sciences it has invented: the question we must ask, in order to estimate the value of a civilization...	制度 ^{[3][8][9]}	3	33.3%
	机构 ^{[4][6][7][10]}	4	44.4%
	学院 ^[5]	1	11.1%
	学术 ^[11]	1	11.1%
	文学创作 ^[3]	1	11.1%
	文学创造 ^[10]	1	11.1%
The French say of literary composition, “Le style, c’est l’homme.”	文学作品 ^[4-7]	4	44.4%
	文学本质 ^[8]	1	11.1%
	写作 ^[9]	1	11.1%
	省译 ^[11]	1	11.1%
The Rev. Arthur Smith, who wrot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 have tried to show,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real Chinaman	尊敬的 ^[4]	1	11.1%
	牧师 ^{[5][8]}	2	22.2%
	可敬的牧师 ^[7]	1	11.1%
	尊者 ^[10]	1	11.1%
	省译 ^{[3][6][9][11]}	4	44.4%

首先, 44.4%的译者将 institutions 译成“机构”, 属于语境义丢失, 与下文的“艺术”“科学”的语境不搭配, 不属于同一概念范畴。“机构”可以看作是一种实体概念, 而“艺术”与“科学”则更偏向抽象概念范畴。这种情况下, institutions 翻译成“制度”会更加贴合语境。如果在这里放一个跟“艺术”与“科学”不同的词, 显得比较突兀, 导致句子内容传递信息起伏较大, 没有贴合语境。这句话是要评估人类文明的价值, 而在人类文明史上, “制度、艺术、科学”相较于“机构”来说都是更加伟大的创举。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起到寓教于乐、风化社会的作用 (史鸿文, 2022) [13]。谈到科学,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正是由于制度的创造, 尤其是现代文明制度, 使得社会秩序得以实现。

其次, 译者过度依赖某些词语的字面义也会造成误读。在上述第二个例证中, 辜鸿铭引用的“Le style, c'est l'homme”, 出自法国散文作家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德·布封 1753 年进入法兰西学院时所作的演讲《论风格》。为了落实“literary composition”最准确的译名, 需要对这句话的前后语境进行考证。李瑞雪与卢敏 (2021) [14]指出, 所谓的考证法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的运用由来已久, 体现了翻译遵循的忠实原则。上下文语境是这样描述的: “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 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 甚

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 风格却就是本人。因此, 风格既不能脱离作品, 又不能转借, 也不能变换” (贺玉高, 2009) [15]。因此, 辜鸿铭这里借用布封的这句话旨在讨论文学作品的风格, 与下文中谈论到之前创作的关于《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以及《中文之道》这三篇文章遥相呼应。

第三种误读现象源自对源语文化的认知不足, 缺乏考证, 导致翻译过程中出现文化丢失现象。阿瑟·史密斯, 又名明恩浦, 是 19 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辜鸿铭在形容此人时用了一个缩略词“Rev.”来形容。目前 9 个译本只有表格中的三种译法, 大致可以看成两种译法, 即“牧师”与“尊敬的”。仅通过背后的文化含义尚不足以判定译名的取舍, 需要结合语境加以分析。如果辜鸿铭在下文语境中描写的是对明恩浦的褒奖, 那么翻译成“尊敬的”无可厚非。但是他在下文中提到明恩浦不能理解中华文化, 所以译成“尊敬的”就显得前后表述矛盾。而且“Rev.”的首字母大写, 更适合译成一种职业或者头衔, 类似的表达经常在英语中出现, 例如“Dr. Lee”。所以, 这里“Rev.”比较合适的译法是翻译成“传教士”或者“牧师”。因此, 通过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含义, 并结合语境与英语的表达习惯综合分析, 能很大程度上弥补文化丢失现象。

2.2 专有名词翻译问题

表 2 专有名词翻译问题实例

英文名	译名	频数	频率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3-11]	9	100%
Voltaire	伏尔泰 ^[3-11]	9	100%
Carlyle	卡莱尔 ^{[3-5][7-11]}	8	88.9%
	施科奇·卡赖尔 ^[6]	1	11.1%
Moltke	毛奇 ^[4-10]	7	77.8%
	普军总参谋长毛奇 ^{[3][11]}	2	22.2%
Arthur Smith	阿瑟·史密斯 ^{[3][5-7][10]}	5	55.6%
	亚瑟·史密斯 ^{[4][8-9]}	3	33.3%
	约瑟史密斯 ^[11]	1	11.1%
Frederick the Great	弗里德里克大帝 ^{[3][10-11]}	3	33.3%
	腓特烈大帝 ^{[5][7-9]}	4	44.4%
	弗伦德里克 ^[6]	1	11.1%
	腓特烈·威廉一世 ^[4]	1	11.1%

专有名词的翻译一直以来也是一大挑战。不单单是动词有多义性特征, 很多名词也具有多义性, 有时同一词在同一文本的不同语境中就有不同的含义。正确把握专有名词的含义, 做到精准翻译实属不易。特色文化名词在其他语言文化中可能并不存在对等词, 只能通过直译加注释的方式让目标语读者理解。因此, 词语的发展受制于其语言本身的特点及语言所根植的社会人文环境, 没有相关文化背景的情况下, 非母语者对这类词语存在一定的理解难度(汪洋, 俞俊杰, 2022)^[16]。作为专有名词的典型代表之一, 序言部分涉及到不少人名, 因此这一部分将聚焦于专有名词的翻译批评。表 2 为部分人名的译例。

根据人名翻译的上述情形, 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级: 完全一致, 即 9 个译本的译名完全一致; 几乎一致, 6 个及以上译本的译名一致; 不太一致, 6 个以下译本的译名一致。不难发现, 对于世界闻名的人物如拿破仑和伏尔泰, 9 个译本的译名完全一致。这些名人的中文译名早已在中国人的认知中根深蒂固, 因此多数译者几乎不会提供不同译名。译名几乎一致的, 翻译的虽然有些出入, 但是整体来看还是比较一致的。如果对历史不太了解的读者, 在阅读到 Moltke 时难免会对其身份定位产生困难。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适当采用增译法或添加脚注, 译成“普军总参谋长毛奇”, 进一步解释会更有助于读者理解, 以免出现阅读断层心理。例如上述表格里的 Carlyle 被翻译成“施科奇·卡赖尔”。经考证, 卡莱尔的全名为 Thomas Carlyle, 是苏格兰维多利亚时代的哲学家、评论家、讽刺作家和历史学家。误译的原因可能源于译者误读, 没有深入、细致地考察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 只是根据源语文本机械翻译。卡莱尔的名字出现的原文语境为“The Scotch Carlyle, for instance, believed in and worshipped might.”译者错把“Scotch”翻译成“施科奇”而非“英格兰”。因此, 如果不对源语文化与历史背景进行深入考证, 出现误译就在所难免。

最后就是译名不完全一致的问题。同一专有名词的译名出现了多样化, 究其原因是多数译者选择了音译。如 Arthur 在翻译界就有两种常见译法, 但是这两种译法很难完全统一, 因为有其他同名的人物已有很高的知名度, 如提到 King Arthur 人们会立

刻想到大不列颠传说中的“亚瑟王”而不是“阿瑟王”。同样地, 美国 20 世纪著名的剧作家 Arthur Miller 在国内以“阿瑟·米勒”的译名广为流传。值得注意的是, Frederick the Great 直接翻译成人名是不太恰当的, 无法体现该人物的丰功伟绩。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 就有一位出名的人物“Alfred the Great”, 成功带领盎格鲁-撒克逊人抵御了丹麦人的入侵, 并编纂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他是英国历史唯一被授予“大帝”称号(the title of the Great)的君主(魏望东, 2018)^[17]。因此, 当今的学术界已普遍认同把 the Great 译成“大帝”, 据此来凸显人物的威望。当然, 直接音译的人物的名字而没有翻译 the Great 的译者只传达出部分信息, 难以实现语义对等。在这种情况下, 译者可以增译或加注, 以补充缺失的信息。

2.3 标点符号转换规范化问题

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 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遵循一定的标准和规范的前提下, 再现文化背后的深层内涵。早在 20 世纪, 图里与切斯特曼就关于翻译规范提出了高深的见解(Munday et al., 2022: 160)^[18]。限于篇幅, 本文只对序言部分各译本的标点符号翻译规范化问题进行论述, 主要论及作品类与排比句的标点符号转换问题。

首先, 关于著作、文章名称的标点使用规范, 以序言部分提及的政论文《战争与出路》为例进行解释说明。根据上下语境以及《春秋大义》的附录可知, 辜鸿铭增加了一篇名为《战争与出路》的政论文, 以便进一步阐释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这篇文章原本为剑桥大学的教授洛斯·迪金逊所作的一篇文章(黄兴涛, 2020: 221)^[5], 但是辜鸿铭以同样的题目命名了自己的文章, 并且以洛斯的文章开头, 旨在增强自己论证的说服力。虽然他在英文表述里使用了双引号, 以此提醒读者这是一篇文章。根据英文的表达习惯, 文章名应当使用引号, 而中文的标点符号规范用法是使用书名号, 因此, 翻译成中文时就不能继续沿用引号。也就是说, 表 3 里使用引号的译本有 5 个, 占比为 55.6%, 均属于不规范的处理。

其次, 是排比句标点的用法。表 3 里 9 个译本的标点用法有两大类, 即顿号与逗号。顿号的使用大致分两种用法: 一是表示较长、较多或较复杂的

并列成分之间的停顿时, 最后一个成分前可用“以及(及)”进行连接, “以及(及)”之前应用逗号; 二是表示含有顺序关系的并列各项间的停顿。在源语文本中, 辜鸿铭使用了“best, soundest, most loveable, kindest, most generous-hearted”这5个词语来描述俄国人, 并列成分较多。8个译本使用顿号, 占比88.9%, 表示这些词语之间是并列关系; 1个译本使用了逗号, 显然忽略了中文并列词语之间使用顿号的规定。当然, 有部分译本使用“和”字代替顿

号, 连接最后两个形容词也是可以的, 其用法就相当于“、以及”。顿号的使用确实更便于读者阅读, 可以更快地厘清各种并列表述之间的逻辑, 不过2011年版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也规定了不宜使用顿号的特殊情形^[19]。当所引内容比较多或者所引内容本身已经带有标点符号时, 如果并列的引号之间再使用顿号, 不仅形式上不美观, 也降低了符号的表达效率(张国功, 2023)^[20]。

表3 标点符号转换失范实例

原文语境	译名	频数与频率总计
I have included as an appendix an essay on practical politics, --an essay on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战争与出路” ^[3]	双引号: 5 (55.6%) 书名号: 3 (33.3%) 无标点: 1 (11.1%)
	“战争及其出路” ^[4]	
	“战争与战争的出路” ^[5-6]	
	“战争和出路” ^[7]	
	《战争与出路》 ^[8]	
	《暴民崇拜宗教或战争及其出路》 ^[9]	
	《战争及出路》 ^[10]	
	关于战争与出路的论文 ^[11]	
	最通情达理、最可爱、最亲切、最不记仇的 ^[3]	
	最高尚、最可爱、最仁慈和最慷慨的 ^[4]	
the best people in Europe, the soundest, most loveable, kindest and most generous hearted people in Europe	最优秀、最高尚、最可爱、最仁慈和最慷慨的 ^[5]	顿号: 8 (88.9%) 逗号: 1 (11.1%)
	最高尚, 最可爱, 最仁慈, 最慷慨的 ^[6]	
	最理智、最可爱、最和善、最慷慨的 ^[7]	
	最优秀、健壮、可爱、善良和仁慈的 ^[8]	
	最善解人意、可爱、亲和、善良、慷慨的 ^[9]	
	最高尚、最可爱、最仁慈、最慷慨 ^[10]	
	欧洲最优秀、可爱、高尚的 ^[11]	

总之,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不仅要忠实于源语文本的字面义, 传达原文的语气、情感以及文化内涵, 还要格外注意翻译的规范性问题。标点虽小, 微言大义。翻译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过程, 用心译好每一毫厘, 才能无愧于源语作者的文字魅力、无愧于万分期待的目标语读者。

3 结语

辜鸿铭是近代中国最具争议的人物, 学界对《春秋大义》的批评声大于赞同声, 尤其是中华文明救西论, 很多著名学者予以严厉批判, 即便是中立者如林语堂、蔡元培等, 也只是对其语言天赋、渊博学识加以赞誉。世人则更多关注于其特立独行的衣着穿戴言行举止, 而非其真知灼见。改革开放后, 辜鸿

铭及其文化观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肯定多于否定, 研究重心逐渐从生平轶事、奇谈怪论转移至思想观点的系统学术研究。辜鸿铭用英语讲述中华文化故事, 不仅走了出去, 走了进去, 而且深入西方世界的人心, 其别出心裁的传播策略与技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大义》的中文译本问题值得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 [1]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
- [2] 霍跃红,邓亚丽.文学作品中情感翻译效度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03): 150-155.
- [3]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陈高华,杜川,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13.

- [4]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何叶,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17.
- [5]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黄兴涛,宋小庆,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2-24.
- [6]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马永琴,译.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16.
- [7]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秦海霞,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 8-34.
- [8]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李静,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 2-16.
- [9]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孙永,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 3-19.
- [10] 辜鸿铭.春秋大义[M].颜林海,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11-19.
- [11]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张恒,译.北京:天津出版社,2013: 1-12.
- [12] 朱海玉,毛新耕.翻译中的文化误读[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30(03): 149-152.
- [13] 史鸿文.论艺术传播的情感还原[J].新闻爱好者,2022(11): 62-65.
- [14] 李瑞雪,卢敏.考证法在翻译实践研究中的运用——以《东
- 睇西望》专栏为例[J].翻译教学与研究,2021,(01): 123-134.
- [15] 贺玉高.在理性主义语境中对布封《论风格》的再解读[J].文艺理论研究,2009(01): 76-83.
- [16] 汪洋,俞俊杰.多语互译视阈下名词翻译技巧研究[C]//四川西部文献编译研究中心,绵阳城市学院.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15). 2024: 7.
- [17] 魏望东.英语散文文学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翻译研究[J].翻译论坛,2018(02): 55-60.
- [18] Munday J, Ramos Pinto S, Blakesle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5th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160.
- [19]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标点符号用法》解读[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2: 44-46.
- [20] 张国功.标有引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顿号使用规范商榷[J].现代语文,2023(09): 78-83.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